

本年度至今最让人振奋的国内现象级艺术大展,居然出现在辽宁省博物馆。近日,随着辽博新馆的全面开馆,国宝云集的“中国古代绘画展”“中国古代书法展”千呼万唤始出来,正式对公众开放。

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宋摹本、唐周昉《簪花仕女图》、五代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北宋徽宗赵佶《瑞鹤图》、元赵孟頫《红衣西域僧图》《秋声赋》、明仇英《清明上河图》……

东晋楷书《曹娥诔辞》、唐欧阳询行书《仲尼梦奠帖》、唐张旭草书《古诗四帖卷》、北宋徽宗赵佶草书《千字文》、元赵孟頫行书《心经》……

39件古代绘画,46件古代书法,几乎浓缩了半部中国古代书画史。据悉,这些仅是第一批展品,曾引发观展热潮的唐摹王羲之一门书翰卷(又名《万岁通天帖》)将出现在第二批展品中,今冬与观众再次见面。



▲唐周昉《簪花仕女图》

随着辽宁省博物馆新馆全面开馆,国宝云集的“中国古代绘画展”“中国古代书法展”也正式向公众开放,并且立刻引发了业内外的高度关注——

这组现象级大展,何以浓缩半部中国古代书画史

本报记者 范昕

“春蚕吐丝描”“披麻皴”……在这些经典画作中,找寻中国古代绘画的代表性技法

了解中国古代人物画的高度,看看现身此次展览的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宋摹本、唐周昉《簪花仕女图》,便略知一二。顾恺之可谓中国美术史上第一位有画迹存世的著名画家,不过存世的皆非真迹,而是以摹本的形式。其中《洛神赋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主要传世的是宋代的四件摹本,尤以现藏于辽博的这件摹制水平最高,也是唯一图文并茂的。画中运用了一种名为“春蚕吐丝描”的技法,是中国古代人物的经典画法,犹如春蚕吐出的丝一般,连绵不断、粗细一致、悠缓自然、安静优雅。画中采用连续多幅画面表现一个完整情节的手法,类似于当代的连环画,这在此前的人物画中亦是少有的。再看周昉,他的人物画特别是仕女画和佛像画的造型被尊称为“周家样”,与北齐曹仲达创的“曹家样”、南朝梁张僧繇创的“张家样”、唐吴道子创的“吴家样”并称为“四家样”,是中国古代最早具有画派性质的样式,为

历代画师推崇。容貌端庄,体态丰满,色彩柔丽,透出一股富贵之气,可谓“周家样”最显著的特征。这些在描绘宫廷仕女于庭院嬉戏玩耍的《簪花仕女图》中都流露得淋漓尽致。这幅画还让人们得以窥见开创于唐代的中国传统仕女画的“三白法”。这指的是在人物的额、鼻、下巴用较厚的白粉染出,既能表现人的面部三个受光的凸出部位,又能表现中国古代妇女施朱粉“盛妆”的化妆效果。

领略中国古代山水画的风貌,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不容错过。中国古代山水画分南北两派,五代南唐画家董源乃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而这幅《夏景山口待渡图》又是他的典型之作。画面以淡墨轻岚绘就的,当是江南的自然风貌,只见烟雨空蒙、草木华滋,令人不禁联想起苏轼笔下的“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这与北派山水画标志性的高耸峭拔的山石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为表

现南方秀丽多姿的山水风景,董源创造出著名的山水画皴法“披麻皴”,中锋用笔,圆而无圭角,弯曲如同画兰草,一气到底,线条遒劲。

至于宋徽宗的《瑞鹤图》,不仅体现着中国古代花鸟画的登峰造极,还已远远超越了单一门类的绘画。画面以工笔展现鹤群盘旋于宫殿之上的壮观景象,飞鹤布满天空,一线屋檐既反衬出群鹤高翔,又赋予画面故事情节。这样的构图一改常规花鸟画传统方法,在中国绘画史上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其中,上半部分描绘的20只仙鹤组成的鹤群,呈现出20种不同的姿态——宋徽宗的画注重写实写生,讲究画理法度,据载他曾亲自挑选宫廷画师,设题画鹤,这百变的鹤群正源于他对周遭事物的密切观察。下半部分聚焦的巍峨宫阙,流露出的则是细致入微的界画技巧,观者几乎可以看清殿脊上的块块灰瓦、飞檐上的只只瑞兽以及檐下木质斗拱的紧凑结构,这样的画只可能出自宋徽宗之手。《瑞鹤图》庄严肃穆中透出的神秘吉祥,分明是一种帝王之气。也正因如此,这幅画在中国绘画史上享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特殊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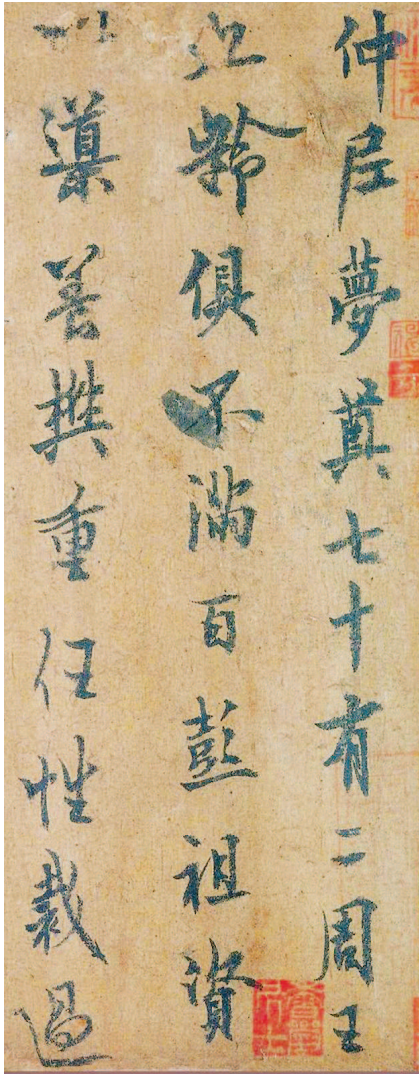
▲北宋徽宗赵佶《瑞鹤图》
▲唐欧阳询行书《仲尼梦奠帖》局部



▲五代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细节



▲明仇英《清明上河图》细节



欧阳询、张旭、宋徽宗、赵孟頫……亲睹这些传世真迹,书法史上一连串响当当的名字不只是传说

尽管备受关注的唐摹王羲之一门书翰卷,并未出现在辽博新开幕的“中国古代书法展”中,然而,这次展览集结的书法作品,依然算得上“顶级阵容”。看看它们的来头——

东晋楷书《曹娥诔辞》,中国现存最早的楷书墨迹。这卷墨迹讲述的是1600多年前曹娥投江救父的感人故事,通篇以小楷书写就,捺笔厚重、结体扁方,尚存隶书笔意,从中可以窥见早期楷书的笔法、结体特征。在中国书法史上,东晋是书法演变最为剧烈的时代,也是书法艺术空前灿烂的时代。在此期间,隶书、章草向楷书、行书过渡,因此可以说东晋是楷书形成的重要阶段,而这—东晋楷书《曹娥诔辞》又恰为迄今唯一存世的东晋楷书墨迹。

欧阳询行书《仲尼梦奠帖》,唐代书法大家欧阳询的代表作。此帖首尾九行,前后78字,欧阳

询晚年写就。欧阳询其实最以楷书闻名,而他的《仲尼梦奠帖》却被认为结体富于变化,最能表现出欧书劲险刻厉、矛戟森列的特色。

张旭草书《古诗四帖卷》,开创狂草书风格的典范,今草向狂草演变的实物例证。唐代书法大家张旭,有“草圣”之称,他在张芝、王羲之今草的基础上升华开创了狂草书风格,在激越情感牵动下促使节奏加快,似金蛇狂舞,又如虎踞龙盘,大有一泻千里之势。他的草书《古诗四帖卷》,在名贵的“五色笺”上,纵情挥写了南北朝时期两位文豪谢灵运与庾信的古诗共四首,落笔力顶千钧,倾势而下,行笔奔放豪逸,连绵不断。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草书看起来癫狂,章法其实相当规范,很多细微的笔划、字间过渡,交代得清清楚楚。

宋徽宗赵佶草书《千字文》,被誉为“天下—人绝世墨宝”。人们熟悉的宋徽宗书法,似乎仅限

解惑:为什么是辽博? ▶▶▶

铜鎏金木芯马蹬、唐摹王羲之一门书翰卷、宋人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即便在大牌博物馆云集的《国家宝藏》节目中,辽宁省博物馆呈现的三件国宝依然光彩夺目。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创办的第一座博物馆,辽博现有的近12万件/套藏品,远不止于与白山黑水相关或是承载辽河文明基因,它们印拓着的,是幅员辽阔华夏大地的文明足迹。

段勇、李晨编著的《国宝星散复寻踪——清宫散佚文物调查研究》一书显示,辽博收藏的清

宫散佚书画作品格外引人注目,总数达146件(组)。其中,晋人小楷《曹娥诔辞》、唐欧阳询行书《仲尼梦奠帖》、唐张旭草书《古诗四帖卷》、唐周昉《簪花仕女图》、宋徽宗赵佶《瑞鹤图》等,都是绝世名作。这里被认为是中国收藏晋唐宋元书画数量最多、品质最精的博物馆之一。

辽博汇集如此之多的国宝,有其历史渊源。1920年代初,末代皇帝溥仪多次想方设法将藏于北京故宫的大批国宝文物转移出去。被逐出皇宫的他,随行带着的珍宝都有几十箱,从天津搬

转到长春,这些国宝文物曾存放在长春的伪皇宫“小白楼”长达13年。1945年8月,日本宣布战败前夕,日军准备将伪满洲国国都迁移至通化,溥仪也从长春逃往通化。临行前,溥仪没有忘了亲自精选书画。最终选中的,在他看来可谓珍品中的珍品,为了能多带一些,他不惜把书画原有的楠木盒和花绫包袱皮统统扔掉。他这一行随身携带的书画在途中被东北民主联军通化军区截获,转交东北文物保管委员会。

1949年东北博物馆(现辽宁省博物馆)成立之时,接收了其中部分重要书画。与此同时,东北文物保管委员会也组织开展文物收集整理工作,在能够找寻到的线索内,将散佚东北、华北各地的部分清宫散佚书画征集入藏当时的东北博物馆。

中华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孕育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但并不是每一处遗产都能得到如同敦煌莫高窟和故宫一样的高度重视和保护,尤其是零散分布在偏远山区的田野文物遗产,可谓文物保护中的薄弱环节。最近,四川安岳石窟佛像遭遇“浓妆艳抹”式修复的事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类似事件长期以来在不少地方均有发生,导致诸多遗产都曾面临同样的尴尬。石窟造像一般均位于偏远的山崖上,有些石刻散落田野,从古至今,所在地村民都将其视为一种具有民俗信仰功能的生活实用品,自发捐资对佛像进行彩绘以庇佑。此类修复不当而造成的破坏,属于善意却无知的“破坏性保护”行为。

在疾呼重视民间遗产保护、抵制“破坏性保护”行为之前,或许,更应该让更多的人明晰,什么才是民间遗产保护的正确打开方式。

擅自修复文物其实是违法的。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修缮,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级别报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批准。即使修复,也得保护部门派专业人员进行。

文物修复最终是为了使文物延年益寿,而不是“返老还童”。《文物保护法》特别提到,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修缮、保养、迁移,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这是“真实性”的保护原则,强调在真实性和原始性的指导下“修旧如旧”,不能按照今人的审美对遗产进行维修、

艺·见

最近,四川安岳石窟佛像的遭遇引起了广泛关注——

“浓妆艳抹”式修复背后的盲区

任丽娜

恢复。

文化遗产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积淀过程。往往一些历史遗存不被当代人所理解,但我们不能抹杀它在不同时期留下的痕迹。保护历史的连续性才能让遗产具有“可读性”。国际文物界有一个共识:即便是残垣断壁、瓦砾、废墟,只要能真实地见证历史,便应得到很好地保存,而且尽可能维持原来的状态。1933年《雅典宪章》明确指出:由于文物建筑的历史和科学价值以及它们传递的人类智慧,它们是过去历史的珍贵见证,应当受到保护尊重。且看,希腊人对历史上损毁的神庙没有给予复原,只因历史原状和加固修复部分之间会留下明显的区别,如今的神庙虽然残缺不全,仍然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意大利在19世纪对罗马角斗场和第度凯

旋门进行的修复,是文物建筑保护史上第一次真正强调保护文物历史价值的维修工程,从今天来看不失为一个现代文物保护原则的重要例证。当时角斗场和凯旋门损坏严重,为了防止文物进一步损坏,进行了以加固为目的的修复,并没有对已损坏的部分加以重建或复原。所用加固材料与原来所用的建筑材料有明显的区别,并在加固过程中对历史信息加以保护。修复后的凯旋门,既有完美的艺术效果,同时保持了复原部分的可辨认性。

在一些遗产资源丰富但修复条件不佳的地区,田野文物保护方面之所以困难重重,常常被归因为缺少资金和技术,其实,更多的可能出于“无知”。当资金和技术水平不到位时可暂不修复文物,但“意识”不到位却可以继续伤害我们

的遗产。日本奈良兴福寺在历史上屡遭焚毁,但每次人们都会奋不顾身地冲进火海把文物抢救出来。是当地民众强烈的文物保护意识,才使很多造像得以留存至今。每一处遗产展现的都是当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许多分散在民间的遗产都与生活区相互重叠,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提高所在地居民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刻不容缓。

文物修复是一件专业性很强的事,但保护、继承和弘扬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不仅是相关机构的责任,也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当保护文物成为一种公共道德和社会责任,“无知”就再也无法伤害我们的遗产。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专业在读博士生)



▲最近,四川安岳石窟佛像遭遇“浓妆艳抹”式修复的事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图为佛像修复前后对比